

碑

林

集刊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碑林

集刊

(八)

2002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碑林集刊》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高 峡

副 主 任 成建正 赵力光

委 员 王其祎 王原茵 马咏钟

主 编 高 峡

副 主 编 赵力光 王其祎 王原茵

编 辑 王其祎 王原茵 路 远

裴建平 岳绍辉 李举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碑林集刊. 8 /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 9

ISBN 7-5368-1498-4

I. 碑... II. 西... III. 碑刻 - 简介 - 西安市 - 古代 IV. K8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484 号

碑林集刊(八)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2 印张 4 插页 430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7-5368-1498-4/J·1226

定价: 60.00 元

2002年1月20日
挪威王国首相邦德维克(左三)来西安碑林博物馆访问。



2002年4月西安
碑林博物馆被国家旅
游局授予AAAA级旅
游景点。图为高峡馆
长(前排右一)接受证
书。

2002年3月西安
碑林博物馆举办“中
日青少年书法交流活
动”，图为笔会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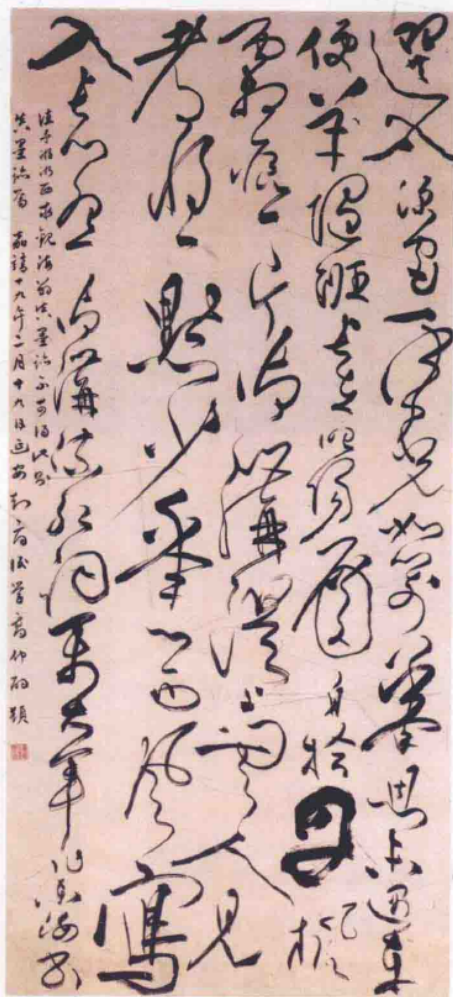




明·董其昌题冯从吾像赞手卷（局部）

全幅 29 × 138cm

藏明清墨迹珍品
西安碑林博物馆



明·张弼草书条幅

148 × 69cm



清·吴昌硕篆书对联 166 × 34.5cm

《碑林集刊》(八)

目 录

●碑林史话

西安碑林历史述略

——兼析西安碑林迁移“三次说” 赵力光(1)

金石学与西安碑林 路 远(20)

西安孔庙概说 马志祥(29)

●碑志考释

《叱罗协墓志》考释 瞿安全(38)

北周《宇文瓘墓志》考释 宋 英 赵小宁(49)

西安碑林藏五方唐代骞氏墓志综考 岳绍辉(57)

唐《李谨行墓志》简考 王晓莉 张美霞(64)

唐大中元年《剑州刺史窦纁墓志》考证 周晓薇(69)

西安出土唐代宦官《梁匡仁碑》考证 王其祯 郝利民(74)

●石刻艺术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平二年”造像考释 裴建平(80)

西安地区出土北朝晚期佛造像及其艺术风格 王长启 高 曼(86)

隋李和石棺线刻图反映的祆教文化特征 陈财经(94)

●碑帖咀华

宋刻宋拓《晋书楼帖》递藏源流考 陶喻之(104)

《来禽馆帖》与《来禽馆真迹》考述 孙建功(118)

●文史研究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论 李颖科 李 怡(122)

略论唐人宅第之营缮 陈忠凯(129)

对唐武德年间隋末官吏与李唐政权之关系的一点思考 苏小华(136)

关于“甘露之变”的一点史料

——读唐《梁元瀚墓志》 黄小芸(141)

《女真文字书》的体例及其与《女真评语》之关系 乌拉熙春(145)

关于李自成夹山为僧说若干问题的质疑 陈生玺(168)

- 神秘的《五岳真形图》····· 秦建明(178)
 浅说“关中八景”的初称及流传起始时限····· 杨巨中(181)

●新出碑志

- 唐《太史丞袁神墓志》考释····· 刘莲芳(183)
 新出唐《李知本墓志》小考····· 张虹冰(187)
 华县新出唐《郑玄墓志》考····· 张 岩(189)
 陕西富县出土唐《环平墓志铭》考略····· 姬乃军 李延琴(192)

●读碑札记

- 读志札记二则····· 王原茵(194)
 西安碑林收藏的几方三阶教碑刻····· 樊 波(199)
 西安碑林藏石与长安开元寺····· 景亚鹏(207)
 《隆阐法师碑》书者正误····· 赵 超(214)
 《韦衡墓志》与盛唐马政····· 赵振华(215)
 唐《司徒高公德政之碑》碑主不是高崇文····· 陈跃进(223)

●六骏研究

- 昭陵两骏流失始末····· 周秀琴(225)
 昭陵六骏中“青骢”与“什伐赤”的定名····· 马成功(241)
 昭陵六骏名实考····· 陈诵雒(246)
 《昭陵六骏碑》研究····· 李举纲(255)

●贞石沧桑

- 突厥《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踏察记····· 王大方(261)
 甘南藏族自治州碑刻摩崖资料述要····· 吴景山(264)

●博物馆学

- 市场经济体制下博物馆管理的几个问题····· 成建正(274)
 浅谈局域网与互联网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应用····· 张蒙芝(289)

●文物丛谈

- 三国西晋时期青瓷罐上的堆塑碑铭及相关问题····· 杜 文(299)
 浅析唐代陶塑镇墓俑的艺术特色····· 杨 兵(308)

●文物保护

- 浅谈两组唐彩绘舞俑的修复工艺····· 付清秀(316)
 小议新技术及新材料在古建筑修缮中的正确应用····· 刘东平(318)

●玺印研究

荒木计雄先生捐赠的中国古玺印 马 骥 陈根远(323)

●书 评

上世纪末殷历研究的总结及其新成果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读后 王 晖(342)

在研究与欣赏之间

——读《陕西古代印章》 赵 熊(345)

●新书简讯

《西安碑林全集》 青 鸟(28)

《陕西名碑刻石欣赏》 吕效祖(56)

《中国古代绘画》出版 寒 蝉(177)

《中国书法》出版 抑 扬(198)

千古传拓留墨香 张懋镕(288)

●学术交流

我馆科研人员参加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第五届年会及学术研讨会

..... 青 鸟(140)

●补白

岳飞书“墨庄”碑刻 天 合(48)

碑与帖的区别 祝 嘉(63)

漫谈《多宝塔碑》 石 峻(79)

西安碑林博物馆网站正式开通 田福宝(182)

金石学家叶昌炽 势 白(224)

西安碑林博物馆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喜 雨(254)

古代的名帖 祝 嘉(263)

拓字术语释要 寅 庵(344)

稿约 (346)

Main Contents

Zhao Liguang

A Summary of the History of Xi'an Forest of Stone Tablets—Also on the “Issue of the Relocation of Forest of Stone Tablets Three Times” (1)

Lu Yuan

Studies of Bronzes and Stones and Xi'an Forest of Stone Tablets (20)

Yu Shaohui

On Five Tang Epitaphs of Qian's Family Collected in the Forest of Stone Tablets Museum in Xi'an (57)

Wang Qiyi

A Study of the Tang “Stone Tablet of Liang Kuangren” (74)

Tao Yuzhi

The Collecting History of the Song Script “Jin Shu Lou Tie” (104)

Chen Shengxi

A Critical Review on the “Issue of Li Zicheng Becoming A Monk in the Jia Shan Mountain” (168)

Wang Yuanyin

Notes on Selected Epitaphs (194)

Fan Bo

Four Stone Tablets of Sanjie Sector Collected in the Forest of Stone Tablets Museum in Xi'an (199)

Zhao Chao

On the Calligrapher of the “Stone Tablet of Master Monk Long Chan” (214)

Zhou Xiuqin

The Insight of the Removal of the Two Stone Bas-relief Horses of ZhaoLing Mausoleum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225)

Cheng Jianzheng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Museum Management under the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System (274)

Ma Ji Chen Genyuan

Chinese Ancient Seals Donated by Araki Kazuo (323)

西安碑林历史述略

——兼析西安碑林迁移“三次说”

赵力光

西安是中国著名的古都,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遗产,西安碑林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向以碑石荟萃而著称,被誉为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宝库、巨大的石质图书馆,有着九百多年的悠久历史,本文将对西安碑林的历史沿革作一概述。

西安碑林的建置与唐代所刊刻的《开成石经》及《石台孝经》的迁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唐天宝四年(745),唐玄宗李隆基提倡孝道,曾诏令“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新唐书·玄宗纪》)并亲自作序、注解以隶书书写《孝经》碑。碑四面刻,其子李亨篆额,额上承云头纹盖,下有三层台座,高大宏伟,故称“石台孝经”。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太学内。

唐开成二年(837),为宣扬儒学,防止儒家经典在传抄中讹误,唐文宗李昂命国子监祭酒郑覃主持将儒家经典刊刻于石,由艾居晦、陈玠等人用楷书书写。内容有《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尔雅》、《论语》等十二种经书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共一百一十四石,二百二十八面。历七年而毕工,因刻于开成年间,故称“开成石经”。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内。

唐末,天祐元年(904),朱温叛乱,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唐纪·昭宗天祐元年〉载:“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当时驻防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便于防守,对长安城进行了缩建,将原来的皇城改为新城,致使原立在长安城务本坊的《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被委弃郊野。同年,韩建将《石台孝经》迁至唐尚书省附近的文宣王庙。据宋建隆三年(962)刘从义撰文的《重修文宣王庙记》碑载:“昔唐之季也,大盗寻戈,权臣窃命。地维绝纽,八盗迁胁于东周;天邑城墟,三辅悉奔于南雍。天祐甲子岁太尉许国圉公,时为居守,才务葺修,遂移太学并石经于此。”天祐甲子为天祐元年(904)。此碑记载了韩建迁移太庙及石经的经过。但所移“石经”并未说明是《石台孝经》还是《开成石经》?一般认为韩建所迁石经是《石台孝经》。清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在石刻十二经条下注云“韩建所移石经,当指《石台孝经》而言”。亦有学者认为韩建迁移了《开成石经》的一部分。

后梁开平三年(909)刘郢将《开成石经》迁至府城内原唐尚书省西隅,据宋元祐五年

(1090)所立的《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载：“(石经)旧在务本坊，自天祐中韩建筑新城，六经石本委弃于野。至朱梁时，刘郛守长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郛请辇入城。郛方备岐军之侵轶，谓此非急务，玉羽给之曰：‘一旦敌军临城，碎为矢石，亦足以助贼为虐。’郛然之，乃迁置于此，即唐尚书省之西隅也。”据《新五代史》载：刘郛是朱梁开平三年夏，平定同州刘知俊叛乱时，取潼关，复长安，被梁太祖任命为永平军（即长安）节度使的。刘郛迁移的石经也并未确指是《石台孝经》还是《开成石经》，但碑文所说“六经石本”应为古人对儒家经典的泛称。碑文又说：一旦敌军临城，“碎为矢石，亦足以助贼为虐。”《石台孝经》仅一碑而已，似不足为虑，故刘郛所迁的石经当为《开成石经》。总之这两种石经经韩建和刘郛先后被迁置到同一地点，即唐尚书省西隅附近。此后，一些著名的碑石亦陆续的迁至此。如碑林所藏《颜氏家庙碑》上有一段跋文曰“……有都孔目官李延袭者，真好古博雅君子也，特上告知府郎中移载于府城，立于先圣文宣王庙，庶其永示多人，流传千古。乃命南岳梦英大师秉笔书记，时太平兴国七年（982）八月二十九日移”。此外，解放后《颜勤礼碑》、《马磷庙残碑》、《兴庆宫残图》等碑刻都出土于此地，说明唐尚书省西隅文宣王庙成为当时石经及其他碑刻的集散地，这些石经和碑刻迁置此地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据宋大中祥符三年（1009）孙仅撰文的《永兴军新修文宣王庙大门记碑》记载了碑石陈列的状况“是军古京邑也，斯庙古国学也。自浚郊建都，降□□府，百司之盛，空余坏垣；三辅之雄，宛若列郡。然故地虽移，旧名尚存，是以民到于今，或以监名呼之。……石壁外周，即异乎藏书之所；苔碑中立，又殊乎丽牲之具”。“石壁外周”应为《开成石经》，“苔碑中立”当指《石台孝经》。

碑林的建立，是将唐石经及其他碑石原存唐尚书省西隅文宣王庙处迁置“府学之北墉”。宋元祐五年（1090）黎持撰《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对迁移的目的、时间、经过都作了较为具体的记载：宋漕运使吕大忠领漕陕右时，目睹石经存放之处“地杂民居，其处洼下，霖潦冲注，随立辄仆，埋没腐壤，岁月折缺，殆非所以尊经而重道。”乃与京兆尹黎持商议“予欲徙置于府学之北墉，子且偕图来视，厥既视图，则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沟塹而基之，筑其浮虚而寔之，凡石刻而偃者、仆者，悉辇置于其地”。工程“始于元祐二年（1087）初秋、尽孟冬而落成。”由此可见，石经及其他碑石，由于原存放地文宣王庙附近，环境不好，故迁至“府学之北墉”。

吕大忠，字伯进，《宋史·吕大防传》载：“元祐初，（大忠）历工部郎中、陕西转运副使、知陕州，以直龙图阁知秦州。”吕大忠遵儒重道，“谢良佐教授州学，大忠每过之，听讲论语，心正襟敛容曰：‘圣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肃’，说明吕大忠对石经搬迁的重视。其弟吕大防宋元丰时曾任知永兴军府事；另一弟吕大临亦为宋代著名学者，考古学家，著有《考古图》十卷。兄弟三人曾被后人列入“关中七贤”。可以说，吕大忠为碑林建立的创始者，功垂青史。根据上述记载，碑林的建立应始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

碑林初建后的陈列收藏情况，《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中也作了较详细的记载：“开成石经分列东西次比而陈列焉，明皇注孝经及建学碑则立于中央，颜、褚、欧阳、徐、柳

之书,下迨偏旁字源之类分布于庭之左右。”“门序旁启,双亭中峙;廊庑回环,不崇不卑,诚故都之壮观,翰墨之渊藪也。”关于《建学碑》,或言亡佚,或言宋景祐元年(1034)所立的《牒永兴军》碑即“建学碑”。^①是碑记载了户部侍郎知永兴军范雍在景祐元年的奏书:“臣伏见本府城中,见有系官隙地、欲立学舍五十间”,旋得到皇帝的敕旨“依奏许立学”。此碑虽有建学之内容,但皇帝敕旨所立建学之碑,刻在唐《梁守谦碑》之阴,似与规制不合;且此碑形制较小,无法与《石台孝经》“双亭中峙”,姑且存疑。

关于石经的搬迁及碑林何时建于现址,有二次说和三次说。上述韩建及刘郇将《石台孝经》及《开成石经》从原唐务本坊国子监迁至府城内唐尚书省西隅文宣王庙处,为第一次均无异义。

二次说认为第二次迁移是由吕大忠于宋元祐二年从“唐尚书省西隅”迁至“府学之北墉”。那么,当时的京兆府学在何处?据前引《牒永兴军》碑所载范雍建学之事,只说建在“官隙地”,未指明具体方位。武伯纶先生考证“官隙地”即碑林现址,^②吕大忠迁移石经即在此“府学之北墉”。自明清以来都是这种观点,明万历十七年(1589)《重修孔庙石经记》碑载:“世传汉唐之末,兵燹相残,石经尝弃于野。朱梁时,始移置尚书省之西隅。至宋元祐间,迁于学宫,即今孔庙地也。”明赵崡《石墨镌华》唐石经条下也说:“宋元祐中,汲郡吕公始迁今学。”清毕沅《关中金石记》亦说:“西安府学大成殿后,旧为碑林,今称碑洞,始于宋元祐庚午龙图阁学士吕大忠”。清代整修碑林的记事碑均持此说。

路远先生认为唐石经进行了三次搬迁。他在《西安碑林初创时期若干问题的再探讨》一文中^③认为,范雍所建京兆府学应在文宣王庙附近,规模不大,其根据是碑林中宋至和元年(1054)的《京兆府小学规》载:“府学榜准使帖指挥于宣圣庙内置小学”,碑文后署名“府学教授”、“提举府学”等官员而推论,既然京兆府小学建在文庙内,又受府学管辖,那么京兆府学也应在文庙或文庙附近。路远先生的观点应是正确的,而武伯纶先生认为范雍建学在“官隙地”即碑林现址,误。因为京兆府学在文宣王庙附近,即唐尚书省的旧址,亦宋代京兆府衙署的所在地,称之为“官隙地”是合理的。

路文认为在宋元丰三年(1080)吕大防曾迁移过一次文庙及府学,其根据是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石刻编著录有《宋京兆府移文宣王庙记》碑,注曰:“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府事吴防撰(按吴防应为吕大防之误),鄜州观察使石苍舒书,元丰三年二月日。”惜此碑亡佚,内容无从而知。但碑名很明确,是迁移文宣王庙的记事碑是无疑的。迁往何处?路远先生认为是迁往“府城之坤维”。“府城之坤维”一词最早见于金正隆二年(1157)所立的《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碑文说“京兆旧学,在府城之坤维,地非亢爽。前宋崇宁二年,命郡县建学,以宾兴贤能,府帅枢密直学士虞公策承命诣学,谓诸生曰:鲁修泮宫,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之颂,是知泮水以育人才也。今府城之东南隅,水易就下,地且文明,欲改卜其处可乎?诸生怡然曰:诺。乃范湖州规制,经营建立。庙学之成,总五百楹,宏模廓度,伟冠一时”。《类编长安志》石刻编著录有《宋永兴军创修府学记》碑和《宋永兴军府学开泮水记》碑,两碑均为“宋大观元年十月立”(1107)距崇宁二年(1103)仅距四年,应视为虞策

崇宁迁学的记事碑,惜两碑也亡佚。

所谓的“府城之坤维”,究竟在何处?皆无史料可确定。武伯纶先生认为坤维不是西南,而是西北,即在原唐尚书省西隅,同时还认为虞策迁的是文庙而不是府学^④。路远先生认为“府城之坤维”不在原唐尚书省西隅,而是另外一地,具体在何处?目前尚无法考稽。并据此推论:第二次迁移是宋元丰三年吕大防将文庙及府学由原“唐尚书省西隅”迁至“府城之坤维”处,宋元祐二年吕大防之兄吕大忠将唐石经及其他碑刻亦随之迁至此“府学之北墉”。宋崇宁二年,虞策将府学、文庙、唐石经及诸多的唐宋碑刻由“府城之坤维”一并迁于“府城之东南隅”,即碑林现址,进行了唐石经及其他碑刻的第三次搬迁。^⑤

辛德勇先生也持类同的观点。在其《西安碑林迁置时间新说》^⑥一文中,对碑林的第一次迁移亦无异义,但认为北宋元祐二年吕大忠将碑林移置“府学之北墉”,即碑林的第二次迁移是错误的,他在文中说:“宋代在西安设永兴军,在永兴军置府学始于仁宗景祐二年(1034),学中同时建有孔庙。据金人李栗在金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所撰《京兆府重修府学记》载:‘京兆府学’,设在‘府城之坤维’。‘坤维’是指西南部,而元代府学亦即今西安碑林在宋元长安城的东南部,方位相差悬殊,显然不在一处。因而元祐二年吕大忠所迁碑石即当安置在城西南部,而不是碑林现址。”

辛文同样未说明“府城之坤维”的具体方位。他在文中接着说:“至宋崇宁二年枢密直学士知永兴军虞策也是因为‘地非亢爽’还有些低洼,才又在碑林处,重建府学和孔庙。李栗《京兆府重修府学记》云‘设在府城之东南隅’。这显然就是今西安碑林的位置。……尽管碑林是否与府学同时迁置今址,史无明文,然揆诸事理,自当一并迁移过来,这是碑林的最后一次迁移。”(按即第三次迁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二次说”和“三次说”分歧的关键在于“府城之坤维”指何处?“坤维”一词出于《易经》,坤卦为西南之卦,故坤维代表西南方向。武伯纶先生认为坤维不是西南而是西北,误矣。

下面我们考察一下“府城之坤维”究竟在何处?前文已述,唐末战乱,朱温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了便于防守,不得不放弃外郭城与宫城,将原来的皇城改建为新城。京兆府所管辖的地区被称为“佑国军”,府衙设在原唐尚书省旧址(图1)。五代时后梁称“永平军”、后晋称“晋兴军”、后汉改称“永兴军”,后周和北宋都沿袭永兴军的称号,宋、金时为京兆府,治所都设在这个新城,府衙署也都在原唐尚书省的旧址处,即今西安市北大街以西至北广济街一带(图2、3)。宋金时泛称新城为府城,顺着“府城之坤维”这一线索,笔者曾查阅了许多相关史料,并在西安城的西南方向踏勘走访,请教了有关专家。到目前为止,在此方向从未发现文庙、府学、碑林留下的遗迹和明确的史料记载。“府城之坤维”亦非金人李栗之妄说,我们应该换个思路来考察这个问题。

宋敏求《长安志》卷上载:“新城,唐天祐元年匡国节度使韩建筑,时朱全忠迁昭宗于洛,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庐舍,长安遂墟。建遂去宫城,又去外廓城,重修了子城(毕沅注:即皇城也)……是为新城。城之制、内外二重。”辛德勇先生对此考证道:“今按审读《长安

志图》文意,可知新城内外二重之制,是就唐皇城城垣之内而言,与唐宫城与外郭城都毫不相涉。《长安志》卷一一、卷一二,数次提到‘府西南’、‘府东街’、‘府西街’、‘府城西北街’、‘府城北街’,这个府指北宋的京兆府,‘府东’、‘府西’、‘府西南’等都应当是就京兆府衙署而言,‘府城西北街’和‘府城北街’当同此。由此可以推测,北宋京兆府在新城中央置有一小城,作为府衙。而究其原委,即可溯及韩建的‘内外二重’之制。韩建最初把新城修成内外二重,应当就是以内城作为京兆府或佑国军的衙署,这一布局形式经五代为宋人所承袭,后又沿至元代,成为奉元路的衙署。”^⑦

辛德勇先生的考证十分精当,由此而推论,“府城之坤维”的“府城”应指京兆府衙所在的“内城”,而这个“内城”当时也称“府城”,就建在原唐尚书省的旧址上。文宣王庙当时亦在此“府城”内。碑林的第一次迁移,即从外郭城的务本坊迁至“唐尚书省西隅”。碑林藏《颜家庙碑》碑侧有宋太平兴国七年梦英所写的跋云“都孔目官李延袭者……特告知府郎中移栽(颜家庙碑)于府城,立于先圣文宣王庙”,也可作为当时内城称府城之佐证。“唐尚书省西隅”即可视为宋京兆府内城的西隅。解放前后,在西大街社会路及北广济街一带出土过《颜勤礼碑》、《马磷庙残碑》等,2000年在西安市卫生局工地(今鼓楼西侧临西大街)还出土过唐碑残碑头及龟座,笔者曾前往观察。这些碑石的出土地,恰好都是京兆府衙署亦即府城的西南方位。由此“府城之坤维”可视为内城之西南部,与“唐尚书省西隅”应同为一处,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李栗在《京兆府重修府学记》中先说“京兆旧学,在府城之坤维”,后面谈到府学将迁的新址时又说“今府城之东南隅,地且文明,水易就下”。此处称“府城之东南隅”(即碑林现址),而未用《易经》表示东南卦之“巽维”,令人费解。笔者认为,“府城之坤维”如前所述是就“内城”衙署而言的;“府城之东南隅”,是否就“外城”即整个京兆府城而言,而用不同的方位词来表示“内城”与“外城”的区别。如果解释为“内城”的东南隅的话,应在唐尚书省的东南处,是无法成立的。古人在碑刻中的用语表述上往往容易产生歧义,我们只能结合实际,通过分析,做出合理的判断。

同是金代,正隆五年(1160)曹谊所撰《重修碑院七贤堂记》也记载了崇宁二年虞策迁学之事,并没有提“府城之坤维”,而是说“京兆府学,乃唐之太学,暨前宋崇宁岁迁于兹地”,与宋建隆三年刘从乂撰《重修文宣王庙记》碑所载韩建“遂移太学并石于此”相合。两碑所述“唐之太学”,均指国子监,原在唐外郭城务本坊内,韩建迁太学时将石经一并迁置原唐尚书省西隅,即新城的衙署内。《重修碑院七贤堂记》所云“前宋崇宁岁迁于兹地”,“兹地”应是碑林现址,因为碑林在金代已初具规模,并称之为“碑院”。故“兹地”绝非路远、辛德勇两先生所说的、目前尚无法稽考的“府城之坤维”。此碑明确说明了崇宁二年迁学是从“唐之太学”迁至“府城之东南隅”,即碑林今址。

吕大忠迁移石经的原因是“其处洼下,霖潦冲注”。虞策迁学的原因之一也是“地非亢爽”,都是由于原地低洼、环境不好。吕大忠应不会将石经及碑石从低洼的“唐尚书省西隅”,迁移到“地非亢爽”的“府城之坤维”,也从侧面证明两地实为一处。吕大忠于宋元祐

二年迁移石经及其他碑刻,据《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载,“门序旁启,双亭中峙;廊庑回环,不崇不卑,诚故都之壮观,翰墨之渊藪也”,说明此次迁移后,修建庭院、碑亭和廊庑,使之陈列有序,形成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群。然仅隔十六年,虞策于北宋崇宁二年又对碑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迁移。《石台孝经》共二十八石组成,《开成石经》一百余石及碑头、碑座,加上其他碑石,数量众多,体积重硕,更何况保护碑石的廊亭等建筑,都是先立石而后建亭庑,搬迁势必要拆除已建成的碑亭廊庑。迁移一次需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实非易事,殊难理解。路远先生将此次迁移放在北宋第三次“兴学”的大背景在来认识,认为是“合乎情理的”。^⑧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也正值北宋对西夏的第三次较大规模的战役,京兆长安是前线的指挥中心和战略后方。此次战役中宋军损失惨重,北宋在陕西的防务每况愈下,一蹶不振。^⑨这点是否可为此次迁移不合情理做一个注脚呢?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李栗《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及曹谊《重修碑院七贤堂记》等碑刻,讲到虞策迁学时只字未提搬迁碑林之事。路、辛两位先生所言,虞策迁建府学、文庙于“府城之东南隅”,唐石经及诸多唐宋碑刻自然也一并迁移,这亦仅是一种推测而已。

通过上述分析、考证,结合两种观点,我们可以对文庙、府学、石经的沿革和迁移作出如下的推论:

宋景祐二年范雍建立京兆府学,仍在文宣王庙或附近,即唐尚书省西隅;宋元丰三年,吕大防将文庙和府学的一部分迁至碑林现址;七年后,即宋元祐二年,吕大忠将唐石经及其他碑刻也由唐尚书省西隅迁至“府学之北墉”;宋崇宁二年,虞策进一步将府学由唐尚书省西隅(即府城之坤维)彻底地迁至“府城之东南隅”,亦即碑林现址,并进行了新建,同时对文庙也进一步修建、改造,在文庙的前面新建了泮池,最终完成了府学、文庙的迁建和改造,形成了府学、文庙、碑林的初步格局。

西安碑林建立后,经历了几个朝代,历经沧桑,既有自然灾害,也有兵燹之祸,但每个朝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一些志士仁人对碑林进行维修和扩增,反映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凝聚力。

自宋元祐二年碑林建立以来,除虞策崇宁二年迁学后可能附带整修过碑林,此后尚未发现北宋有整修碑林的记载。

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后,女真族入主中原,西安也置于金王朝的统治之下,金朝的统治者在对待汉文化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政策。《金史·文艺列传》云:“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不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说明女真人普遍接受和学习汉文化,在金朝统治的一百多年间,曾对府学、文庙、碑林进行了四次整修。

金贞元三年(1155)对府学、文庙进行了整修。据金正隆二年(1157)所立的《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载:“自罹兵革,残毁几尽。贞元乙亥岁,河间韩公希甫亚尹京兆,视事之三日……。今此庙堯倾圯,黻宇頽弊,何以仰副明天子作成之意?遂即议于府君完颜公胡女,遵奉朝廷之命,鳩工计役。”这次整修是奉朝廷旨令整修的,整修的内容有祠堂、殿庑房舍,重绘了孔子及列贤的画像。历时一年,虽未提到修碑林,但文庙碑林同在一处,有可能附

带整修。

金正隆五年(1160),河中府同知府尹耶律隆和陕西东路转运副使周维甫对碑林进行了整修。据曹谊撰文的《重修碑院七贤堂记》碑载:“(文庙)宣圣殿后,旧有玄宗序注《孝经》石台并文宗群经碑院一区。……彼所谓石经者虽森严壁立,然严霜烈日,暴其燥烁,淫风涕雨,饱其渐渍,苍苔翠藓之斓斑,牧童樵子之□琢,逾二十载,几不免湮没荆榛瓦砾间。”耶律隆、周维甫谒文庙时,遂命工匠整修,对建筑及碑石“蝌蚪篆隶,龟趺龙首之属”,都进行了修葺。整修后“前后瞩望,灿然一新”,这是自碑林建立以来第一次明确记载的整修。距元祐二年已逾七十三年了。另外,碑文中有“碑院”一词,说明在金代碑林曾称之为“碑院”。

金哀宗完颜守绪正大二年(1225),对碑林进行了整修,据刘渭撰《大金重修府学教养之碑》载,这次修复是参知政事、行省京兆完颜合达组织的,“发廩粟,出帑资,以为斋盐之费。……檄有司督工役,支倾补缺,联断洗昏,植踏碑于茂草,基废址于蕪蔬。殿宇翠飞,石经堵立,斋厨廊庑,焕然一新。”这次修复系女真人完颜合达主持,在战乱不息的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

金末正大年间,碑林曾遭受了一次严重的破坏。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十石经条下叙述了石经的历史后说:“正大辛卯迁徙,悉以摧仆,至庚戌,省幕僚王琛奉而起立。”^⑩“正大辛卯”即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正大辛卯迁徙,悉以摧仆,原因何在?骆天骧并未具体说明。据路远先生考证:金正大四年(1227),蒙古军队攻灭西夏,乘胜入陕,围攻凤翔,京兆告急。正大六年(1229)窝阔台继承汗位,亲率大军征金。正大八年春,凤翔城被攻破,京兆不可守。金军主动放弃京兆,退守潼关。元至元十三年(1276)所立的《大元国京兆府重修宣圣庙记》碑也云:“京兆旧有宣圣庙,辛卯弃城,殿宇倾颓。”可能是金人主动放弃京兆时,曾计划将城中的贵重财物、图书典籍,包括石经东迁运走。为了搬迁,故人为地“悉以摧仆”,大概由于战事紧迫,未及运走。便弃城东撤了。虽石经摧仆,但没有运走,实乃不幸中之大幸。^⑪至“庚戌”(1250)年,此时金已亡,为南宋淳祐十年,蒙古国定宗贵由汗死后,其皇后海迷失执政的第二年,“省幕王琛奉而起立”,距正大辛卯已逾十九年。王琛,史籍无载这名儒士文人,在战乱之际,整修石经,对保护碑林功莫大焉。

蒙古国灭金后,仍称西安为京兆府。忽必烈建元统一后曾将京兆府改为安西路,后又改为奉元路,一直作为陕西等行省的治所。元代曾对府学、文庙、碑林进行了几次整修。

元至元十三年所立的《大元国京兆府重修圣庙记》碑载:“京兆旧有宣圣庙,辛卯弃城,殿宇倾颓,总管田候,护持仅存。甲辰岁,征南先锋使夹谷公□□扈国昌言,慨然以修复自任。即葺正殿,复起二门,工粗毕而力不能继。又十余年,平章廉公,参政商公宣抚陕西,乃为构其两庑,绘事未兴,二公入相。迨转运使□公假馆于学也,率□属僦工为图之。”从碑文记载看,共进行了三次修葺,历时十四年。“甲辰”即公元1244年,尚未建元。夹谷公,史籍无考,“慨然以修复自任”,整修了正殿及二门,工程较粗且财力不继。过十余年,平章廉公,参政商公宣抚陕西。据《元史·廉希宪列传》、《元史·商挺列传》载,平章廉公为

廉希宪,字善甫,参政商公为商挺,字孟卿。两人是在宪宗蒙哥时期,于公元1254年被任命为关西宣抚司正副宣抚使的。两人于中统二年、三年(1261—1262)进京入相拜参知政事和中书平章政事,故两人宣抚陕西时整修文庙的时间应为公元1260年前后。整修内容为“构起两庑”,但“绘事未兴”就进京入相了。后转运使□公(字渤姓名不详),“率口属僦工为图之”,最终绘制完成。

《大元国京兆府重修宣圣庙记》碑还记载了元至元七——八年(1270—1271)对碑林的一次整修。碑文在记叙了前述的整修后说:当时陕西四川行尚书省平章赛公,驻□巴蜀,行省正奉严公视时之明日,祇谒庙下,徘徊顾瞻,见庙貌“狼籍若此”,有愧于心,愿出己俸,为诸公倡,整修文庙,“于是省府僚吏暨在学儒生,莫不欣然赞叹,咸愿出钱而助之。……所鳩之货,总为钱二千□□缗。”遂“命京兆总管府判寇君元德董其役,经始于至元七年之冬,断手于明年之夏。”工程整修了大成殿、先圣先师及从祀者之像、内外二门,同时对碑林也进行了整修,“石台孝经,唐明皇之御书也,为之起楼以贮之。石刻九经,开成间之故物也,为□架□以庥之。又作二堂于大门之内,东□先正七贤之祠,西则亭□斋居之次,……爰择吉日,舍菜告成,诸生济济,骏奔在庙。礼殿高明,法庭宏敞,周庑深□,重门洞彻。”整修工程的倡导者为陕西四川行尚书省平章赛典赤瞻思丁,一名乌马尔,回回人;工程由严忠范规划指导,严忠范,山东泰安长清人,当时在陕西作官;具体施工由京兆总管府判寇元德负责,工程历时半年。这次整修对石台孝经“起楼以贮之”,开成石经“架□以庥之”,“庥”《尔雅·释言》曰:“庇庥,廕也”,即架棚。修建楼亭、棚架,以防日晒雨淋,对保护碑石起到了较好地作用。

元至正六年(1346)所立的《奉元路重修庙学记》碑也追述了这次整修,碑云:“奉元本京兆,汉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镇于陕者,平章廉公希宪、参政商公挺、金事严公忠范,先后作成宣圣庙、儒学于郡东南,有礼殿、有仪门、东西庑为从祀之舍,殿后有石经之亭,唐人石刻附焉。仪门这外有斋宫,外□都宫,有棖星门。此其大略也。时东平徐公琰方为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实记而刻诸石,则至元十三年丙子之岁也。”此碑记述清楚,将当时文庙及碑林的格局展现于我们眼前,“礼殿”应为大成殿,其后为碑林(当时碑林附属于文庙);“仪门”即戟门,为今日之小殿,两者之间为东西两庑;仪门外为斋宫,再外为“棖星门”,即今之石门。这与今之碑林格局大致相似,据此可知,在至元十三年前,作为今天西安碑林博物馆馆址的文庙和碑林的建筑格局已基本形成。

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石刻编、石经条下在叙述金正大辛卯迁徙,石经摧仆后说:“至元十四年,碑尽摧倒,天骧与孟文昌充西府教官,请灞桥堂邑刘斌而复立焉。”^⑫这段记载中所谓“碑尽摧倒”似无可能,因为前述至元七——八年,刚由严忠范、寇元德等整修完文庙及碑林,当时的元朝社会相对安定,不可能再将石经人为地“摧倒”。只能理解为前文所述金正大辛卯弃城时所摧倒的石经及其他碑刻。由王琛奉而立起的主要是石经部分,而王琛作为一幕僚文人,并未全部立起。骆天骧等请刘斌所复立的碑石应为其他唐宋碑刻,可以说是王琛所做修复的继续,已相隔二十七年。^⑬